

約嗨

Party and Play¹

Kane Race 著；梁俊文譯、黃道明校訂

現下全球男同志愛滋防治的公眾論述中有一種正規的傾向，那就是以摒棄用藥、甚至約炮文化來定位愛滋防治的實現。本文的目的在對這種拒認的傾向提出回應。這種趨勢的問題在於，愛滋防治變成了公民的道德服從（而那是酷兒生活往往溢出的），而非將注意力放在實際會傳染HIV的特定實踐，以及用有創發性的方式來修正這些作為。事實上，非法藥物的使用在男同志社群以及社交聯繫的形構裡，早就是性實踐和社會實踐的一部分。在許多相關的愛滋脈絡裡，這些社交聯繫進而形成有效回應愛滋的社群基礎。從這個面向來看，前述拒認用藥的態度也就恰恰否定了那些根本的文化脈絡與實踐。愛滋防治如果要有效，就必須關注這些脈絡與實踐，以及它們所形構的性愛社群。

我們所面臨的一項挑戰，就是得去生產性文化、實踐、關係的相關分析，並透過這些分析去識別、指認、呵護內在於這些文化中的照顧、安全及愉悅之種種可能性。這篇文章將要探究的，就是男同志情慾文化裡一整套相對來說新興的特殊文化實踐和活動。這種新文化有賴於新式物質與社會科技的安排，像是無線網路、3G和約炮軟體。我把這些裝置視為**性交遇的新興基礎建設**。

我想關注的是這些裝置設備的物質特殊性，我想指出它們如何以新的方式媒介性交遇，讓某些活動、關係及實踐成為可能，但也同時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我並不是說，科技環境就全然決定了這些實

1 【編按：本文為 Kane Race 教授於2015年6月6日在台北市狐狸野營的公開學術演講講稿及實錄】

踐，但是，在尚未掌握這些約炮裝置的操作性、預設用途、設計特色之前，想要試圖理解這個文化的新興規範、互動模式、人們抱的寄望、乃至一般的活動流程等，其實是很不容易的。當然，這新的性愛文化源於過往的男同志實踐歷史，但如果將此刻的約炮文化視為過往釣人文化的最新版本，那麼我們就會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社會科技的安排在形塑這種文化輪廓及形式的特殊性。在同志都會區，釣人實踐已有長遠的歷史，但是這個新文化已經長出了新的形式和類別。有東西正在蠢蠢欲動……一個新的文化正在浮現、轉變。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性互動與情慾社群在類別和實踐層次上正值轉變的重要時刻。因此，與之相關的分析與理解絕不可少。

我最關注的一組特別實踐在參與者間稱為「約嗨」Party and Play（也通稱Wired Play、ChemSex），這種「玩」法指的通常是在某個參與者住家中、使用某些藥物而進行的性愛。PNP以及其相關的事物，例如：網路、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多P性愛，而因為這涉及了用藥和HIV傳染的關連，所以皆被愛滋流行病學及行為研究文獻視為致病的病態場域。這些文獻除了將愛滋傳染與物質使用牽連在一塊之外，幾乎不曾將這些行為理解為一種文化。對參與者來說，「約嗨」是組有意涵的活動與實踐，有其組織運作邏輯及相對凝聚性。縱使這些實踐與活動本身存在已知的風險，對參與者而言，那仍是愉悅、連結、情色、親密經驗的珍貴來源。對PNP的分析將有助於我們指出男同志愛滋防治的核心弔詭之處：許多被流行病學家視為病態之處，恰恰是苦心經營的重要社會聯繫之所在，亦是構成社群關係與照護關係的情感基底。

然而，社會醫療科學並非詆毀男同志藥物性愛的唯一論述。PNP在男同志社群以及酷兒批判論述裡也大致上是個被輕蔑的對象。Tim Dean在他的著作*Unlimited Intimacy*中，把設於街頭或電影情節場景的昨日情懷邂逅式性愛，拿來跟「網路上常見的劣等無套肛交性愛」做對比。在這裡，這種網路情慾文化被視為「惱人的親密私密化」，「公共場所中的社交與性愛」正好與「電腦螢幕前的孤獨性愛」形成對比，而後者則是體現了認識他者的「一種純然工具性」，彷彿街頭

上發生的性愛一概平等、無差別對待！另外，2004年紐約一項社群倡導活動，也把過往的社群政治及運動跟這種被認定為孤獨、原子化的網路約炮做對照，並用了一個意象來傳達某些PNP實踐的關鍵配備所座落的典型社會場景：電腦螢幕、個人頁面、煙嗨用的玻璃管等，全都位在使用者孤獨的居家空間。

現代社會和政治科學中的一個主要概念，就是認為科技物件（technical objects）的興起應該對社群與社交性（sociability）的崩解負起責任。也就是說，任何關於科技、工具、商品等等的工業物件（industrial objects），都大幅削弱了真實社群所蘊含的社交性以及社群政治，而這種思維在諸多網路約炮的研究和例子裡隨處可見。儘管如此，我還是要反駁這樣的研究傾向，因為我認為我們必須多花點心思去看這空間裡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必須審視現代科技物件到底如何媒介了社交，而不是只會發出懷舊的怨懟。

就這面向來看，我把PNP視為一更廣泛取徑下的例子，藉以理解網路一性愛一藥物情慾文化中的性愛及其社交功能，也就是把性交放在「玩」的框架中來理解。網路上的男同志通常用「玩」這個關鍵字來安排他們的性愛。「找玩嗎？」（Looking to play?）是網路約炮蠻常見的開場用語，而丟出這個問語也起了些作用。首先，它試著探問對方有沒有想要在真實世界約炮的意願，因而揭示了線上參與的表面基礎。其次，這問語也標明了性交遇是隨興、好玩、沒啥大不了的。第三，這個問題預先排除了其他線上的互動模式，就是會這樣問的人不是來哈啦、收訊、隨便逛逛的。在一般的認知裡，「找玩嗎？」相當於網路釣人。但是，「找（玩）」與釣人有幾個重要的差異。例如，最顯著的差異就是，「找（玩）」是如何發生的、以及這個「約」又是如何被環境、視覺所中介。PNP算是這種較為寬廣性愛框架中的一部分。要指明的是，不是所有的線上約炮都是PNP（僅有約15到20%的男同志說他們找的是PNP），然而要是沒這個框架或線上裝置的話，PNP是不會以現在這種形式出現的。

更進一步來說，「玩」這詞彙的經常布署讓我們洞悉這個文化的安排以及性在其中的操作。在齊美爾（Georg Simmel）極為精彩的

「社交社會學」裡，玩樂形式（play-form）（該怎麼玩）是社會形構（social formation）的重要面向。他認為「玩」是種非工具性形式的結社：於此，刺激的交流是指導原則，而個性、一絲不苟的內涵、實質性的目的則是被置換掉，以便維繫結社的樂趣。的確，有著工具性目的或得到嚴肅結果的個人需求或慾望，往往被視為玩樂形式的阻撓。把性愛描述成玩樂，就是將性愛從那種強調私人親密、相互發展的論調中移除。也就是說，這樣的提法指向齊美爾所說的社交性（sociability），凸顯了情感結社組裝裡頭的性愛布署。對他來說，「玩」有個重要的社交連結功能，而這也就是為什麼他會說，「清楚不過的是，人們不管有無充分理由，都會埋怨社交的膚淺」。

和這個將玩樂視為相互連結機制的觀點共鳴的是拉脫爾（Bruno Latour）等人提出的科學研究取徑，拉氏有時將之稱為「關連社會學」（associology）。在其專著*Assembling the Social*裡，他反對社會科學將「社群」和「社會」（the social）當做詮釋框架的普遍傾向，彷彿其法則和屬性可以概括解釋任何特定狀況。相反地，他建議我們去追溯各種異質元素如何與時並進，看待它們是如何以不同的形式及組裝而產生關連。對愛滋文化研究來說，這種取徑有著特殊的價值：「社群」在愛滋預防上的重要性廣被認定，愛滋社會研究和社群教育裡也時常援用「社群」這個概念，但它卻往往被化約為一種理念或一種固定的形式，繼而在後來的轉變中受到污損。經由這「關連社會學」的研究取徑，以及把「玩」視為連結的關鍵機制，我們可以追溯當下的性愛社群是透過什麼特定的方式組裝起來，同時也謹慎看待各種物件、技術、裝置在這開展過程中的操演作用力。

接下來，我想提出三個跟近來同志性愛文化的新興形構有關的特色。他們分別是：1）先行設定的實踐與慾望；2）共同打造的幻想與性愛憶測；3）續嗨的形構。以下我依次來談：

先行設定的實踐與慾望

網路約炮的措施讓參與者有機會在個人頁面上用文字和圖片，不一而足地列出特點及想做的實踐。在性交遇前能用文字即時聊天而且

相對匿名，這不同於傳統男同志性愛環境，像是三溫暖或釣人場所，因為以往在性愛發生前並不盡然得有長時間的言語交談。網路釣人因而是個很特殊的性媒介，因為它讓使用者可在線上採取對自己有利的呈現方式，可以選擇性地對他們物色的對象釋出關於面貌、特徵、興趣等資訊。許多使用者對這個特點非常賞識，也以不同方式加以利用。像是有一次，我訪問了一個女跨男的跨性別者，他就認為這個特點對他來說很有用，因為他可以在同意跟對方見面之前，以相較安全的匿名方式，就實踐、慾望及可能性，來好好商討可以怎麼玩。這個特點也被愛滋感染者或是非愛滋感染者用來找尋有相同HIV狀態的炮友，因為他們有些時候會嘗試安排進行安全的無套性愛。我在他處曾討論過這些措施如何涉及血清狀態配對（serosorting）做為一種預防實踐的擴散。這樣的關連有著諸多的意涵，好壞都有。接下來，我想以2013年我在雪梨網路約炮軟體上的對話截圖來做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感染狀態配對的探試」。有意思的是，和我聊的這個人並不想直接講他的感染狀態，但是他給的訊息表示他其實是想要找無套性愛，而他所做的假定是，如果有人同意要玩無套，那此人必定是感染者，不然的話也明白風險為何。這很典型，顯示在告知感染狀態時常出現某種程度上的含蓄。第二個例子是「遮掩式的告知」。在這裡，我向對方表明我是HIV感染者，這對我而言很容易的。在愛滋污名的環境裡，能夠坦然告知其實是種特權，這種優勢的分配不均，而且也還沒成為一種普遍的能力。第三個例子是「感染狀態配對失敗」。和我交談的是一對想開性愛趴的情侶，他們問我是否「安全及HIV陰性（safe and neg）」，而當我說我不是的時候，就沒下文了。「安全及HIV陰性」這個新語彙是從感染狀態配對的文化裡冒出來的，而它完全混淆了安全與感染狀態的關係。這跟以前談愛滋防治很不一樣，因為以往安全等同於帶套的實踐。由此來看，那段交談的終止顯示了人們為什麼在面臨揭露感染狀態時會感到遲疑。第四個例子是「病毒量（viral load）作為防治身分的出現」。和我交談的這個人顯示他的偏好實踐（無套的1號）而非HIV感染狀態。然後我問他的感染狀態，他回他「（病毒量）測不到」。這個策略所指的是，跟測

不到的人做愛感染的機會比較低（而這不是沒有科學根據）²，希望的是對特定性愛的可能性保持開放，也意在減緩社會對感染者貶抑。接著我問他一個有點蠢的研究問題，「要是我說我HIV陰性，那會怎麼樣？」，結果他回道：「那你不會等到現在才說」。此處可見的是一種算是已然成形的互動類型。在這個模式裡頭有著約定成俗的談論互動方式，用以組織參與者的期待與詮釋，讓反思或察覺成為可能。

一些受無套實踐者歡迎的網站列有「HIV感染狀態」欄，在選單上人們可以挑「病毒量測不到」來替自己宣傳。這說明了醫療臨床資訊已經進入了性愛實踐的建築結構體，並強化了特定低風險實踐的基底及與之相關的預設和期待。

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揭露自身醫療狀態的新興類別有賴一種能力，也就是以相對匿名但明確的方式，與炮友商討臨床標記的傳染力與感染。在這個空間裡，炮友們可以使用一種相對匿名但是高度明確的客觀標記，來跟其他人討論感染狀態，而線上裝置進場安排性事，則別緻地提供了這種能力。

性愛憶測

第二個特色其實是從上述衍伸出來的。炮友們在網路上以匿名訊息傳遞的方式創造了一個新的文本（textual）空間，裡頭不單只是欲求性愛活動的各自表陳，更是雙方經對話格式聯手打造的情慾幻想及場景，而這可能是約炮的前戲，或無關有沒有約成（有些參與者會把這叫做「隨便聊」）。這是個重要的進展，因為這種對話格式所構成的空間，在以前不曾出現。我把這類的交流稱之為「性愛憶測」（sexual speculation），它們本身構成了一種「玩」的型式，懸浮於純聊及追求工具性目的（也就是有約到炮）之間的不明空間。對某些參與者來說，那會是挫折感的來源，而這也就是為何常在個人頁面上看

2 編按：根據2016年夏季發表的大型研究（PARTENER Study），服用抗愛滋藥物而病毒量測不到的感染者完全不具傳染力，也就是傳染率為0。這歷時4年的研究從14個歐洲國家招募了1166對感染狀態相異的同性戀及異性戀伴侶。在實驗過程中有11人感染，但基因列序檢定顯示全都不是被他們的伴侶所傳染。實驗參與者共進行了至少58000回合的無套插入性交，結果完全沒人因此感染。

到「我沒時間力氣陪你閒聊」的直白陳述。但對其他人來說，閒聊本身即構成一種情色實踐，有時透過文字、圖片、自拍照來活絡情慾對話、有著下標點符號般分句的頓揚作用。情慾對話可能涵蓋了過往性經驗或廣泛的性實踐討論，以及同志A片（俗稱G片）中的特別場景等等。情慾臆測除了讓人們去實驗他們自己可能要什麼東西、見識性愛的可能性、訂立自己「玩」的界限，這樣的線上情慾交流還把幻想給物質化，變成各種更具體的慾望、意圖，還有機會。當然，它同時也是一種篩選機制，讓人們可以挑選、篩選對味的菜。雙方在網路上所共築的幻想往往也形構了後續實際約炮的期待，不過，要是約成碰到面後沒有達到那個共築出來的美好，那麼往往會以失望收場。

Adam等人（2011）認為「文字具體化的幻想構成了網友互動的方式，就像雙方共同寫一齣劇的腳本」。他們也提供了一些實例，說明了網友們實際見面之前在線上積極討論的無套肛交實踐，與實際見面進行無套肛交，兩者間有關聯，即便他們宣稱有要帶套做的初始意圖。此外Adam等人還指出了一個特別有趣的論點：性慾望、性意圖、甚至性身分並非先存於網路交遇之前，而是在事件的開展過程中逐步浮現。這顯示了現下性愛基礎建設（sexual infrastructure）別緻、深具生產性的屬性。因為線上媒介既是一個再現的空間也是互動的手段。也就是說，這些約炮軟體不僅提供一個可以安排性邂逅的具體管道，也在閒聊、G片和性愛之間生產了新的相鄰性（proximities），為幻想與實踐搭起了一道橋梁。例如，許多約炮網站就常常附有很顯眼的G片網址連結。看G片在這裡就成了眾網友在尋覓性愛時的一種樂趣。G片情節幻想和實際被安排的性愛互動，兩者之間就產生了關聯。這種性愛活動安排的指標性意義就在於，性愛組裝（sexual assemblage）裡蘊含著偶然性及變動性。這個透過各種安排聚合而成的性愛組裝，中介並轉化了身分以及各種組成元素的本體（ontologies）。這裡並非是在提倡一種簡化版本的媒介效應，而是希望對這個媒介效應結構所蘊含的生產性及冒出來的因果關係，提出更特定的關注模式。

連續玩／續嗨的形構

第三個跟現下情慾文化有關的特色，通常被稱為「玩嗨」（wired play）、「延長幹」（extended session, long session）、「不設限」（uninhibited session）、「群交」（group play）。我其實是把這個特色想成是色情片中會出現的「異域」（heterotopia）狀態，這種玩法是指任何試圖打破一般日常生活循規蹈矩的時間性，建立一種身在「他處」（elsewhere）的感覺。在約炮軟體上的個人頁面或聊天視窗裡，有人會特別指出想找長時間做愛，且通常會找多人連續玩好幾個小時或兩三天。這種久幹的玩法大概就是Hurley和Prestage（2009）所分析的「加強（長）型性愛派對」（intensive sex partying）。我會指出這種玩法的目的，是想把注意力再度放在社會物質的裝置（sociomaterial devices）上，因為這種特定派對場景的出現，就是奠基於社交裝置的物質基礎。如果不談這個基礎，那麼我們可能就會對這些憑空出現的派對不加以思索。相反地，這些派對並非發生於抽象的空間，而是經由特定的實踐、物件、裝置和安排，才能得以進行。「冰」（ice，甲基安非他命的俗稱）大概就是這樣的場景下被使用、打開了特定的性實踐空間：「冰」除了增強性的感官，同時也讓使用者保持清醒、專注。用者可能固著於特定的活動上，例如長時間看G片打槍或在軟體上找菜。另外，「冰」也可以延遲射精，但射了也沒差，因為打出來並不一定是約炮場景裡最終、最神聖的目標。或者應該說，能夠保持專心一致地探詢各種情趣的可能、持久恆常地做些什麼，反而是比較被看重的。「冰」呈結晶狀，放在玻璃管裡燃燒呈煙狀呼進，有些人則會拿來注射，而GHB（G水）通常是計畫再來一炮之前會使用的藥物。這延長時間的場子很明顯都跟性有關，拿來消磨這些時間的活動包括了純放鬆、閒聊、看片子、呼煙、滑手機看軟體上的菜、用G水、做愛、在趴主家獨自相處或是跟其他人互動尋歡，都有可能。「冰」的用法通常是自己先呼，再跟人有性的互動，這麼做能讓使用者進入一種心理的情慾模式，卸去日常的拘束，在找菜、開啟性愛話題、共築性愛幻想的時候，可以比較坦然自在一些。如果這些都沒起作用——很不幸地，現實往往不如預期，失望、孤單、挫敗等等的負面情感通常都會因為藥物作用而增強，而讓自己變得悶悶不樂。

這些性愛趴可以大致地理解為「玩」的實驗模式。那到底是什麼被實驗了呢？男人與男人之間到底可以在社交環境中做些什麼？陽剛氣質、男人的肉身、情趣效果通通加總起來，又會是怎樣的場景？在這些場景裡頭一再發生的，通常是真實的性愛接觸、討論看過什麼片子、分享性經驗、分享親身經歷的故事……等等，都讓「實驗」發揮功效。若以德勒茲的斯賓諾莎式（Spinozist）行為學說的概念來說，PNP參與者通常是直覺地去回應、實驗那些在熱切、劇烈的情感及思想活動中產生的多重性及可能性。無論在任何一個特定組裝中（跟誰玩、跟怎樣類型的人一起、做了什麼事情）經驗到的樂趣多寡，趴客多會在某些時刻脫離原本所處的狀態、開始去做別的事。若以這裡通篇在談的例子來說，PNP參與者的情慾憶測就會再度啟動，而這有可能是上約炮軟體、開始嘲弄上面某些人、講他們的八卦，然後大聊過往的經驗。另外有一種可能的情況可能是，剛剛那樣玩了一下覺得還滿歡愉的，但後來的場景卻有點悶，然後每個人就如同在辦公室工作一樣，專注於自己的螢幕，著了魔似地在網路上找新的人來加入。不管是哪種情況，享樂被懸置、暫緩了。這不但是個嘗鮮的意志，也是個換口味的集體形式。儘管找炮友常常發生，但其實這不會是原子化的或是孤立的活動。能夠找對象一起玩這件事情，其實有個是群體的場景，其中炮友們在在顯露了想要更多性交流（sexual sociability）的意圖。

結論

這篇文章裡我大膽指出了一些男同志網路約炮的特色以及性愛模式。約炮既是一種「玩」的型式也是性愛憶測，這讓男同志們在約炮現場可以透過其陽剛氣質的實踐或經驗來體驗各種身體的情慾可能性。若以「玩」來理解這些約炮實踐的話，炮友們之間的交流其實變動很大，有時很好玩、但有時也形式化的收尾，這也是為什麼通常炮友不會這麼容易成為情侶的緣故。值得一提的是，人們的常態身分與他們實際的性愛實踐之間所產生的斷裂。正當婚姻和一夫一妻制逐漸獨霸同志情慾的公眾論述之際，維持炮友網絡卻比以往更容易、方

便，是進入這個網絡的大好時機。人們也可以透過約炮軟體的「我的最愛」功能，持續追蹤他們約過且不錯的對象。也就是說，約炮軟體讓性愛交流更隨性、更即時，而且更有機會重複約，無論他們是陌生人或只是半生不熟的炮友，只要是人正在線上、正在找炮（例如現約）、或就在附近，就有機會。若將這個組裝理解為一種親密情感的整體基底，那麼這種親密同時就有了情趣及社會性的兩種面向。這些實踐和約炮裝置都在在維持且劃出了都會男同志之間的相識機會、社交性的某個特定範疇。性，於是優先成為連結和相識的主要機制。但因為網路約炮不用付費，所以容易滋生出各種特定的情感連結，而這包含了多樣實驗性質的親密關係。在這脈絡下，Michael Warner所稱的「陌生人社交性」（stranger sociability）的意義也就不一樣了。社交軟體所開展的男同志交誼、交流、交媾空間，裡頭各種愉悅經驗、情感變動、和手機裝置所引發的現場互動情境，都可以讓我們掌握這個空間中所組裝出來的社會樣貌。

男同志健康論述也許會關注我上面所討論的新興浮現的性／風險協商話語，尤其是想著如何讓參與者們也可以留意這套話語如何運作。但這種讀法，其實蘊含一套截然不同的防治教育思維，因為它不僅預設主體有主權、有意圖、有理性行為能力，而其預設的主體能動性則意味主體要在各種情境底下都擁有自我決斷的能力。以這樣的方式去思考主體及其能動，將會忽視臨時性的關係和依附（provisional relations and attachments）。進一步來說，想去區分性愛組裝裡的構成元素好壞，是不可能的，因為若真有個好壞評斷，那麼這些元素的本體及其所蘊含的健康概念，就只會僵固不變。所以，我的取徑就會是去探討這些元素如何組裝起來，無論它所產生的結果是好的還是壞的。但我們在這個構成的過程裡，必須要有警覺、保持關注，因為它可能同時潛在危機及轉機。而我把這個取徑稱做「憶測性的實用主義」（speculative pragmatism）。具備這種取徑的性健康教育，才會對物質社會性（socio-material）所連帶的關係性和生產性有所敏感。

問答

Rainbowchild：在你所說的無套實踐網站上有提到，使用者可以在個人檔案介面上勾選不同的感染狀態。我好奇在澳洲 BB（無套性愛）或是煙嗨（甲基安非他命性愛）的場景，PNP 這類用藥性愛派對的參與者他們關注感染狀態是一個常見的現象嗎？還是這是一個站方的好意，但實際上沒有多少人會去溝通感染狀態或是在意這些選項？

Kane：我知道的是台灣男同志約煙嗨或 BB 的人並不一定會告知他們的感染狀態，而在雪梨，用藥性愛場景有其在地性，但也並不是人人都覺得告知感染狀態是一件自在的事。我認為我們需要認清的是，告知問題其實跟政治環境有很大的牽連，因為在感染者的生命裡本身就有很多污名，有輿論壓力、不想被拒絕、甚至是被官方通報的恐懼。在雪梨的脈絡裡，我注意到在告知時，有些人會用一種半遮掩的方式：「你有在無套（fuck raw）嗎？」、「你有在用無套約炮網站嗎？」。也就是說，若不是身處於無套文化，你就可能對這些用語完全沒概念，而有在上無套約炮網站的人大概都會知道，那裡都是感染者。這些符碼化的暗語其實有弦外之音，特定族群才會解讀這些行話。所以，在台灣的脈絡裡，若有人要求要約無套性愛，也許我們就會假設那人是感染者、或是他多少知道且願意承擔感染風險。

關於人們是否嚴肅看待感染狀態這件事，我想很難概括而論。有些人會在他的交友檔案上面清楚地表明「若你是 HIV 陰性請別找我，我不跟 HIV 陰性男同志玩」，他們並不希望自己傳染給別人。不過也有些情況是跟約炮軟體使用者的當下心情有關，例如當人們正嗨、正爽的時候，也許就不會把他人交友檔案看得那麼仔細。也就是說，不同的情緒狀態會產生不同的使用機制。例如，在某個情境或脈絡裡，也許有些人會特別在意病毒量，或是根本對感染狀態沒有意識

。我們除了必須去看見這些脈絡是如何體現，也需要去觀察人們的實際作為與腦子裡對減低風險（risk reduction）的算計能力是否一致。

若去看些交友檔案，會發現使用者會循著特定機制去跟別人互動。像是交友檔案裡面有很多個人化的分類和選項，勾不同的選項就會對不同人產生不同的意義。例如，有些人可能不會介意你抽菸，可是有的就會極度排斥。不過若發現某個人是你的天菜，那麼某些分類可能就不那麼重要了，所以我們無法以偏概全地限制某些選項的意義。另外，無套交友網站經常會因網友回饋而更新選項，例如感染狀態欄位裡就會有不同的選擇，例如（病毒量）測不到（undetectable），所以這就顯示了這個網站的使用者會特別關注感染狀態這個面向。然而，手機 APP（像是 Grindr 或是 Scruff）又與桌電不同，可能就沒有提供制式選項讓人使用。

參與者：我好奇約炮網頁或是交友軟體上的使用者在描述他們的感染狀態的時候，會不會有不坦誠的現象？另外，使用者上傳照片的時候，這些軟體有沒有審查裸露程度的機制？我自己在用 BeeTalk 就會遇到照片太裸露而被刪掉個人檔案的問題。

Kane：你其實很難真的知道對方是不是陰性，因為有些人可能從來就沒有驗過血，而篩檢也有空窗期的問題。所以，感染狀態配對的情況其實充滿了風險，有些人甚至戲稱這是在彼此猜測血清狀態（sero-guessing）。但對陽性的人來說，他們在感染狀態配對的時候相對地面臨的風險比較少，因為當他們在進行告知的時後，人們通常不會去懷疑，所以沒什麼必要去騙人。除了信任的問題外，聲稱自己陰性未必代表什麼，因為這跟你是否時常去驗 HIV 有關。假如一個 HIV 陰性者一直以來都仰賴感染狀態配對跟人家無套，感染的機會其實會蠻高的。有關照片的尺度問題，桌電的社交網站跟手機軟體的審查機制不太一樣，像是 Grindr 可能在主要頁面上就無法上

傳三點全露的照片，但若是私訊的話就沒這個限制。

Ray：台灣的話還是有人在使用拓峰網 1069，使用者可以決定是不是要把私照開放給別人看，但像是大頭照還是會被審查。

Rainbowchild: 台灣的法律有規定，在公開的地方不能放猥褻照，不過偶爾也會有過於嚴謹的情況。

Rainbowchild: 我想接著問，剛剛 Kane 也有講到 **slamming**（注射安非他命）的問題。我兩年前注意到英國的媒體開始報導 **slamming** 的普遍情況。我想問澳洲這種情況普遍嗎？就我所知，澳洲男同志使用煙的性愛場景也有一段時間了，且比台灣早，我想問問看當地是否有發展出像英國那樣的注射使用文化？如果還沒發展出那樣普遍的趨勢，是有什麼樣的原因嗎？台灣大概是在 2008 年才真正開始流行呼煙起來，只是沒有像英國或澳洲那樣的普遍。

Kane：雪梨確實有注射安非他命的現象。我並沒有特別觀察到煙嗨的人口有上升的趨勢。有個數據是 20% 的人在過去六個月有玩藥，而其中大概 5% 或是更少有注射安非他命的經驗。注射安非他命會特別被關注是因為使用不潔針具跟 C 型肝炎的傳染有關。另外從一個民族誌的觀點來看，注射安非他命的實踐者與拳交的場景構聯在一起，於是在煙嗨性愛的圈子裡就出現有無注射的區隔機制。

由於雪梨有減害的基礎建設，注射工具長久以來相對容易取得，且雪梨男同志藥物注射派對也已行之有年。喵喵（**mephedrone**）這種藥物在倫敦很普遍，也聽說有人用打的，不過雪梨沒這類藥物，但甲基安非他命在雪梨是很普遍的。在澳洲比較關切的問題是，注射「冰」的成癮依賴性。不過因為每個地區的性實踐文化都有其特殊性，我在這只能做出憶測性的描述。

參與者：我前陣子訪談了一個朋友，他說他三十幾年來都沒有辦法好

好享受性愛，所以他有一次約炮的時候不小心碰到煙。他發現煙能夠讓他開始享受性愛，之後就上癮了。但後來我幫他分析了一下，他其實不是對物質成癮，而比較像是性愛的成癮。現在他的狀態是，有扁的他都可以約。後來他發現，有些對象並不想跟他無套，於是那些人就聲稱自己是感染者，以為我那個朋友就會不跟他們玩。也就是說，他們預設了一般人不會跟感染者無套煙嗨的立場。在圈子裡面聲稱自己有愛滋且藉由疾病的恐懼去拒絕跟別人無套，不曉得 Race 教授會怎麼思考這個問題？

Kane：藥物使用跟性慾之間有個很有趣的關聯。我們聽到一些質性研究的說法是，人一嗨就只想做愛。這時，是否該戒掉用藥、重新學習及重返一般性愛模式，就成了討論焦點。在用藥情境裡，藥物跟性愛之間的關係確實密不可分。你的那位訪談對象如此執著於他所慾望的事，某程度上顯示在公共討論空間裡，男同志的某些慾望是根本無法想像的。這裡有一個比較關鍵的是，對於這樣的人，藥物讓他們跨越一些禁忌去做他慾求的事情，而平常這些慾望是不被認可的。只有在用藥的狀況下，才能把這些羈絆都解除掉。在我的專書《酷兒用藥政治》的最後一章，我把這種讓性愛的模式稱之為「例外的性愛」。

至於你關注的另外一個議題，我不太能夠明確回應你。不過，我認為當有些非感染者就算想要 BB，感染者本身未必會答應，因為他並不希望傳染給別人。我能說的是，在拒絕別人時通常都創意百出找藉口！假裝自己感染 HIV 這種策略的確有可能發生，人家就是不想跟你做愛啊（眾笑）。

參與者 B：在澳洲的脈絡裡，HIV 感染者是否有被當作同志情慾階級的鬥爭工具呢？我這樣講是因為台灣前一陣子有一個國小老師跟其他人發生性行為，後來法律將他定罪。這個案例帶給了感染者族群一定的恐慌，然而在我的經驗以及接觸到的個

案裡，有發生過一群感染者彼此相識，發展到最後互相搶男人的狀況，然後有人就用法律去恐嚇、甚至試圖告對方，威脅對方說如果你不跟我搶男人我就不告你。我想知道在澳洲是否有類似的案例，也想問是否有相關法律在限制感染者的性行為？

Kane：澳洲的愛滋入罪相關條例在每州都不太一樣。以雪梨所在的新南威爾斯州為例，有條法律就要求感染者必須告知他們的感染狀態，但這條法律幾乎沒有被執行過，而這跟早期的安全性行為教育是有關的，因為你只要把套子戴好，你就不用講了嘛！所以當時反而是不鼓勵揭露感染狀態的。但在維多利亞州（墨爾本的所在州）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感染者除了被要求告知感染狀態，對蓄意傳染也有罰則，同時也有被起訴和重判的案例。剛好在三周前，維多利亞州的愛滋運動者就做了很多努力要撤銷告訴，而他們也上訴成功。我認為 HIV 入罪化的法律對情慾的交涉構成了很多阻礙，也有黑函或是勒索的事件發生。另外，在加拿大是執行愛滋入罪化最不遺餘力的國家，近幾年起訴的案例也有增加的趨勢。也因為通訊科技進步的關係，有人甚至在約炮的時，會把自己告知感染狀態的聊天內容儲存起來，萬一別人蓄意提告的時候，可以做為保護自己的證據。

Ray：一般台灣多是不會拿這個東西去告別人，比較多的狀況是在網路散播輿論或是私底下放黑函，說某人是愛滋感染者或是常常呼很多等等。因為若是在用藥性愛的情境下，你自己也是用藥的那一方。

Ray：在台灣的脈絡裡，公衛期刊上有精神科醫師綜合了國外研究指出，任何減害策略對於煙嗨的性行為都是沒有有效的。也就是說，**Kane** 所描述的那些煙的特質，在台灣的公衛邏輯裡是會被建構成更容易傳染愛滋的。那位精神科醫師並不建議在男同志性愛場景裡進行任何的煙嗨減害，而是整個杜絕。如

同 Raibowchild 所說，煙進到男同志社群大概是 2008 年，這跟當時搖頭丸跟 K 他命的流行情況不太一樣。搖頭丸跟 K 他命在那個年代，社群本身比較有長出草根的減害方式，但是煙癮社群好像還沒看見這一個發展，儘管會有口耳相傳的減害措施，可是都沒有經過太多的確認。不過，我知道民間團體私底下都有做一些訪談或是試著發展能夠幫助煙癮社群的作為。我想問 Race 是怎麼看那個精神科醫師引國外研究做出的結論。若不同意這個說法，那麼也想問澳洲是不是有發展出一些重視愉悅的煙癮減害方式。

Kane：澳洲的愛滋防治民間組織一向都以減害的取徑來幫助社群裡的人減少惹上麻煩的機會，例如接受社群用藥的既有現象，並提供一些資源，像是乾淨的針具。儘管如此，「冰」在強大的禁絕論述當中有一種「用一次就立馬上癮」的特殊屬性而難以跟成癮劃清界線，所以它的相關減害做法時常遇到一些困境。像我這樣談「冰」減害的人，通常會被視為沒有責任感的（笑），因為這些類物質的減害很難與公共論壇接合，所以若要適切地改造使用者的實踐其實是越來越困難。

甲基安非他命大概是從 1999 開始在澳洲流行，一直到現在有為數不少的人從以前呼煙到現在，也沒像媒體散播的那些牙齒掉光、臉頰下陷的照片那樣可怕，但很遺憾的是人們不會關注這個面向，而事實上在一些成癮敘事裡，也未見提出任何數據做為證據。不過，煙的確是一個效用很強大的物質，也越來越多用的人惹上麻煩，這跟男同志使用搖頭丸的脈絡類似。

我所讀過的行為科學與流行病相關文獻裡，愛滋感染跟藥物使用並沒有關鍵性的連結。有很多討論是關於這兩者是否有因果關係，因為有些人可能是真的用了太多、但也有些人可能是經過風險算計且願意承擔風險，所以兩造間並沒有絕對的關聯性。有些情境層次的分析通常會以下結論的方式說用煙跟愛滋感染有關。不過，在某些情境裡就不是這樣的

情況。例如，愛滋感染者用煙會傾向於無套性愛，但若性對象是沒有感染 HIV 的，那他們就會協議用保險套。這是那種論斷式分析沒有看見的面向。

黃道明：這跟 Ray 說的那個精神科醫師例子形成了很大的對比。另外，澳洲官方最近推動了全國性的反冰毒運動。（Ray：台灣也一直都有）。

Kane：的確，澳洲掀起了一場反冰毒的道德輿論，長久以來男同志論述本來就容易受道德訓誡箝制，現任澳洲總理因為一些特定政治因素而致力打一場反冰毒戰爭，男同志社群也連帶受到波及。

Kane：另外，我想丟出一些有關用煙會卸除戒心（disinhibition）的複雜論辯。我讀了很多情境層面的研究，這類研究在觀察人們實際在藥物性愛的時發生了什麼事情，然後往往導出「做愛時別用藥」的結論。然而，有意思的是，有研究指出，非感染者男同志用煙與否，其實都不會影響他們會不會戴套。卸除戒心的概念在於，人們在藥物效應之下也許會去做一些平常自己無法做但是想做的事情，但慾望本身還是會有一些模稜兩可的地方。例如，人們到底是藉由藥物把自己弄茫然後實踐那些早就潛藏在內心的慾望，還是說在用藥的情境底下這些慾望才浮現。如果我們依照典型生理學來看，甲基安非他命的確提升了人的敏感度，但它其實並不會讓你失控，特別是在需要做決定的時候，像是要不要戴套、決定做感染狀態配對的能力。主流敘事認為，人們一旦用煙就無法理性做出決定、或是喪失了考量風險的能力，其實有很多例子可以用來駁斥煙必定等同無套的說法。如果我們沒有把這個決斷能力考量進去，我們的觀點就很容易就被生物決定論所簡化與支配。

黃道明：我想多討論一些剛剛提到的馮姓教師案。

參與者：馮姓教師案現在判決已經出來了，之前大家都認為對方要舉證給他定罪，因為跟他做愛而感染。但是現在的狀況是，感染者的性對象無論是不是感染者，只要發生性行為，他都會被罰。但在感染者圈子裡的說法是，你只要服藥到病毒測不到的程度，就不會有傳染的風險。

黃道明：關於愛滋入罪有個明確的項目是「傳染未遂」，到目前為止台灣絕大多數案例都是以傳染未遂去辦的。在馮姓教師案裡，馮師本身是病毒量測不到的感染者，而檢方找來 14 個證人裡有 12 位是感染者，結果就出現了新的入罪方式，即「交叉感染未遂」。這罪名很荒謬，因為它認定兩位感染者不可能同意進行無套性交，這是因為一方除了有把自己「可能有的」抗藥性 HIV 病毒傳染給對方的風險，也有可能感染對方「可能有的」的抗藥性 HIV 病毒，因此雙方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我早先有跟 Race 教授聊到此事，他認為在國際上，交叉感染入罪在醫學上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可是台灣公衛依然不會認可無套性交，即使雙方都同意也不行。這個案子的判決書裡，法官還建議檢察官去辦那些感染者證人。

參與者：這的確非常荒謬。另外在這個案子之前，有個人跟感染者上床然後提告的案子，但最後無法舉證，然後該感染者被判無罪。這個案子顯示的荒謬之處在於，你只要有上床的證據就可以提告。

Kane：這司法判決對我來說愚蠢至極，以刑法來處理公衛完全沒用。在聲勢漸長的國際愛滋運動中，已經有很多愛滋除罪論者，他們皆努力以公共衛生之名倡議，因為愛滋入罪化的刑責有太多負面的效果，例如人們因為污名的關係而不敢去驗血、或是對一些機構提供的服務產生卻步。所以，我好奇的是，台灣在地感染者社群內部是否將愛滋入罪化視為有問題的，以及社群如何回應這個法律現況。

參與者 D：我有個律師朋友在跟一些民間團體正在想要如何做回應，

只是詳細情況我不是很理解。至於感染者內部，就我觀察目前沒有聽到類似的說法。

黃道明：民間團體確實有在推除罪化，但是就我的觀察，民間團體和感染者社群內部的回應層次有點不太一樣。Race 教授所好奇的是，有沒有從感染者社群做出的具體回應。

Kane：那麼感染者沒有發聲，是代表他們同意愛滋防治條例 21 條嗎？

參與者 E：我想是不同意的，但是因為他們沒什麼能力改變現況或是有管道可以保護自己。

參與者 F：我有一些感染者朋友在約完炮之後都希望有一些感情上的交流，然後以「找到人生伴侶」做為目標。在澳洲，感染者在交友軟體上或是轟趴場子裡，有沒有發生過類似這種少女般的期待呢？

Kane：我覺得找到長久的愛人這個期待還不差啊（眾笑）！有在參與這次文化的人都深知，他們大多是要找男朋友的，但有趣的是，就像很多交友檔案上的自述寫的，他們同時也想要找些樂子！約炮軟體通常給人很多失落感跟孤單感，所以很多人會批評說由那衍伸出來的性愛文化很膚淺，無法發展出穩定、長期的親密關係。只是這一直都存在於男同志文化啊，因為無論要在三溫暖或是 APP 上找到合適的人都很難啊！我覺得有趣的是，人對於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跟他實際做的事情之間常有一個斷裂或分歧。

我的另外一篇論文 "Speculative Pragmatism" 就是試圖說明，跟同志的實體世界（如公廁、三溫暖）比起來，APP 的框架讓使用者在網上與人互動時，能保有無需承諾的性交遇。即便那些軟體經營者提供了很多交友類型的選項讓人勾選（如找男友、純交友、找約會），用戶自己也會斟酌怎麼跟人聊。不過眾所皆知，大家用 APP 主要的目的就是約炮嘛！

所以，重點是，在不同的人際關係層面和情境裡，人們如何在使用時溢出了這些框架，賦予它新的脈絡、甚至打破既有框架。例如，短暫的邂逅歡愉也許就有潛力生產不同的關係形式，這本身就是慾望跟實踐的混合體，每次的因緣際會都可能有不同的變形。

像「NSA」（No Strings Attached，沒情感羈絆）這種沒有情感牽扯的交友模式，即便前提是不要彼此綁住，但實際上在交往過程中又可能會碰出火花，而有多重的發展可能。正因如此，NSA 模式其實讓大家可以放手一搏，創造出不同多樣的親密關係。

參與者 G：可是在床上談感情很解耶！

參與者 A：那你可能只是預設了很解。

參與者 B：我身邊的朋友他們用煙，然後對方要求要 BB。一開始會遲疑，但當下用煙的時候，產生了親密關係跟情愫，然後彼此都感覺可以進入情侶關係，於是就開始 BB 了，最後因此感染 HIV。我聽了很多這樣的故事但是不曉得是真是假。我想知道有沒有方式是至少可以讓他們停下來思考？

Kanc：你所描述的情況聽起來很複雜。一方面，藥物中介了這段關係而且產生了熱切的情感，另一方面，浪漫親密關係也隨之開展。你朋友聽起來像是把無套視為親密的象徵，在煙的作用下，人就更投入特定的情感狀態。我其實沒有什麼解方，只能說無套並不一定只跟親密關係有關，因為不做保護的性愛所展現的意義其實有很多種。我們也許可以對浪漫愛有一個批判的視角，既然我們能建構一個特定的浪漫場景，那我們也可以有能力對自己的性幻想有一個批判的態度，不要對自己的幻想太有自信！我想這也是某種不讓自己沖昏頭的保護機制。

黃道明：這談何容易！（眾笑）

Kane：最後我想提一下「承擔個人風險」這種說法。有個已經過世的 A 片男演員在 1997 年出了一本自傳。他說，為了更親近某些人，他願意承擔感染得病的風險。無論他是否成功發展出親密的締結，但他對自己所冒的這個險是很清楚的；自願承擔風險這一面，我們也應該要看見。

